

海外流失中国金银器研究

王美艳 谷欣蕊

(湖南工业大学 陶瓷学院 包装设计艺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中国金银器代表着民族的审美、信仰,其物理和文化特性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魅力,而中国金银器的海外流失对于我们来说是块文物伤疤,本文将简要说明金银器流失原因,并从设计的角度,对流失海外的代表性金银器进行阐述分析,探讨金银器流失的文化影响。

【关键词】海外流失;文物;中国金银器

一、引言

“流失文物”主要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一百余年间因非法的和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但从广义上讲,在时间上应不做限制。金银在古代中国与财富、信仰、权力、社会地位相关联,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已出现错金银工艺,金银矿的开采也逐渐产业化,在唐代达到金银器设计史的第一个高峰。“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双线的贸易往来,使中国文化更加多元,中国也逐渐形成有自身文化特色的金银器体系。

这些器物中有许多流失海外,我们从广义范围对海外流失中国金银器进行研究,以案例展开分析、从流失的原因和文化影响等来对海外流失中国金银器进行阐述,以更加深入了解中国金银器的发展与文化交流。

二、金银器海外流失的途径

金银器流失海外主要集中在晚清鸦片战争后,流失因素主要有两方面。战乱背景下的某些文物贩卖者成为金银器向外流失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他因素则主要包括战争掠夺、外国人的偷盗贩卖和所谓的探险搜寻。

(一) 金银器流失途径之一——走私与买卖

走私贩卖是金银器流失的重要途径之一。一般而言墓葬盗掘与文物走私贩卖是紧密联系的,前者作为盗墓者的物质来源,后者则为财富的直接来源。

1. 国人盗掘墓葬与走私贩卖。中国历来都存在盗墓者,一般而言,墓葬盗掘的基本目的就是人对财富的寻求,基于这一心理,对盗掘的文物进行转手贩卖,以获取暴利。这些器物往往不只经过一次贩卖,经过多次转手便有许多器物流入海外。陈明峰在《民间文物流失忧思录》中提到1949年后文物流失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的文物走私,则成

为我国文物大量流失的最重要原因。”^[1]这也证明了无论处在什么时期,文物的流失与某些国人的行为存在直接联系。

2. 走私贩卖的其他相关情况。战乱背景下,有部分文物宝藏的传承人因家道中落而将财产变卖,这部分人通过古董商将文物流出,而国内古董商实际上作为交易贩卖的中间人,与国外古董商等合作牟利,致使金银器等文物外流。卢芹斋作为民国最大的古董商贩,经他流出海外的文物众多,对中国文物的海外流失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金银器的被动流失

金银器向海外流失的重要时期是鸦片战争后,晚清,中国发展政策与世界发展趋势背道而行,英法联军首先进行了文物的掠夺,大量文物集中流失,对中国文物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基于这一背景,金银器的被动流失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渠道:外国侵略者的战争掠夺、外国商人的盗掘贩卖、外国探险队的攫取。

1. 外国侵略者战争掠夺。中国近代史战争使得金银器等文物大量流失,一方面归责于侵略者的暴行,另一方面,在历史发展轨迹中落后、地大物博的中国吸引了众多帝国主义国家来瓜分中国领土,分割中国财产,这就是当时金银器流失最直接的现实原因。

2. 外国商人盗掘贩卖。中国近代历史背景的特殊性造成了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所谓的传教士或商人对中国墓葬进行盗掘,将盗掘的文物或直接带回自己的国家,或将其流入市场进行贩卖。20世纪初,怀履光以传教士的名义在洛阳金村东周王陵墓挖掘6年,致使众多器物流向海外,这对中国文化史而言无疑是又一次创伤。

3. 外国探险队攫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民

众对文物价值认知缺乏，且 19 世纪掀起的探险热、考古热也一直持续着，探险家们以低廉的价格带走了中国大量金银器等文物。地大物博且国力孱弱的中国在外国探险家眼中可以说是一块名和利双丰收的宝地，他们在中国进行宝藏的搜索，并收入囊中，这一类人以探险名义将中国宝藏带离，造成了瑰宝的外流，对中国带来了文化伤害。

三、流失的金银器

以齐东方所述中国金银器的发展阶段为线索，从东周至春秋战国、唐代、辽代三个时期海外流失的金银器进行阐述，这三个时期分别代表着金银器发展初始期、成形期、发展期，也是海外流失金银器中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一）东周至春秋战国金银器的流失

柳扬在《瑞士乌尔泽藏秦式金银器》中提到：“春秋晚期和战国中晚期是中国金器发展史上两个硕果累累的阶段，当时饰金新技术有了长足的发展，镶嵌金银与鎏金等工艺也开始流行。”^[2] 海外流失的这一时期的金银器瑰宝已呈现出高贵华丽的艺术特色，且能看出中国金银器发展初期的工艺特征，同时也代表着中国金银器的发展程度，接下来将从中选取代表性案例进行分析阐释。

1. 东周流失金银器。在东周流失金银器中具有代表性的即是黄金剑柄，据载，这件东周黄金剑柄出土后被进贡给皇帝，珍藏于圆明园中，之后流失于大英博物馆。当时黄金并没有玉或青铜地位高，黄金作为一种装饰，镶嵌在青铜器、漆器表面，纯黄金制品很少，而此剑柄通体镂空，雕刻蟠虺纹，做工繁缛精细，华丽异常，足以见得纯黄金制的剑柄其珍贵程度，这也是古代区分等级的标志。

这把黄金剑柄采用了浇铸与铆合的技法，把青铜和黄金铸造在一起，金银器发展初期，人们倾向将自己所有的技术用在未知领域上，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金盞也是以青铜器铸造工艺而成，实际上这种方法并不是适用于纯粹的金银器具，因此，这把黄金剑柄铸成的难度是非常高的。

2. 洛阳金村流失金银器。金村古墓是中国考古界的伤痛，金村文物大量流失与当时的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有着极大关系，怀履光在《洛阳故城古墓考》中详细记录了金村东周王陵墓的信息，其中有很多错金银和鎏金的青铜器，其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不菲。当时，金村文物还流失在市场上，多个国家对金村文物进行了抢购，直接导致了器物组的拆分，流失于各国博物馆。

金村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件与金银有关的器物分别是金银错狩猎镜和银质人像。金银错狩猎镜是目前中国最早的人物镜之一，这面圆钮铜镜，镜背六组金银错纹饰，其中一组刻有骑士与虎对峙搏斗的图案，画面右侧是一着盔甲武士蹲在披甲的战马之上，正向一猛虎刺去。左侧的立虎作欲噬状，全身饰以鳞纹，这一组图案生动形象地刻画了人与虎搏斗的场景。从整个器物来看，线条刻画的细致工整，周围以龙变形的涡纹为装饰，刻槽处附上黄金装饰呈现了历史审美，凝聚了中国的历史文化信息。

银质人像已流入日本。此像高约 9 厘米，两臂下垂，两手半握，着长抵膝部的深衣，窄裤，跣足。学者对此人像的身份进行了研究，孙机在《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中对此银质人像进行了分析，论证了人像的种族归属，也对其价值进行了阐述，“它是在秦兵马俑之前，我国雕塑中最富于写实风格的人像之一，在先秦时，具有这种水平的作品不多见。它以真实细致的表现手法，向我们显示出当时宫廷小臣的装束与风貌。”^[3] 我国银制品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这尊人像从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言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唐代金银器的流失

1998 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发现了一艘唐朝时期的沉船，名为黑石号，船上载有大量中国文物，包括瓷器、金银器等数万件，当时作为商品流出，这批文物仍属于流失文物范围，齐东方在《“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中论述了黑石号出土器物的类别及文化背景，并针对其重要性进行了阐述。^[4]

黑石号商船上出现的唐代金银器中最具代表性的金银器则是伎乐纹八棱金杯。伎乐纹八棱金杯高 9 厘米，这一金杯曾在上海博物馆的黑石号展览中与何家村出土人物纹八棱金杯共同展览，其器型尺寸是目前已知类型中最大的。此金杯共有八个棱面，每面焊接由金片锤揲而成的不同人形，根据其面部特征推测应为西域胡人，金杯侧面有环形指鐐。此杯相较于唐代同类金杯，制作的精细程度上略低，每个棱面只有一个人物像为主体，人物周围并未出现錾刻的纹样装饰，只在棱面交接处有联珠纹装饰，杯口有一圈钱币纹进行装饰，这与同时期的唐代金杯的繁华程度不太相符，推测其更像一件未完成作品。总的来说，这一批打捞出的器物精美，正是唐代金银器发展繁荣的印证。

（三）辽代金银器的流失

发展平和期有一批辽代金银器流失，李缙云1995年在《流失海外的一批辽代金银器》中汇总了34件辽代金银器。在这批器皿的方形盒中，有多件鎏金盒都是相似的工艺风格。基于此对这一批器物中的两件鎏金银盒进行简要的分析。方形四兽纹鎏金银盒，盖上高浮雕圆形图案，四兽两两相对，兽首有角，垂毛，形似山羊，前蹄腾空，动态感强烈，兽中间以花纹填充，方形羽人纹鎏金银盒，盖顶高浮雕四羽人纹，四羽人纹间隔四仙鹤，盒身高浮雕舞伎，周围饰以流云纹，整件器物相较兽纹盒更具有分量感，在装饰纹样上也更加丰富。

这两件方盒在工艺与纹饰上继承着唐代风格，从工艺来说，这两件方盒都采用了局部鎏金的方式，《辽代金银器》中提到与唐代工艺与纹样的继承关系，“局部鎏金是唐代金银器普遍使用的装饰工艺，既突出主体纹饰，又增添器物的华贵。这种风格宋代有所削弱，而在辽代金银器中却大量保留着。”^[5]从纹饰而言，辽代的许多纹饰也是广泛吸收唐代而来，最后演化成自己的风格。如方形羽人纹鎏金银盒上的舞伎，与唐代胡人伎乐金杯有着相似之处，唐代伎乐纹饰在金银器中的普遍出现，自然成为辽代金银器纹饰的参考范围。

四、流失金银器的文化影响

综上，分析了金银器流失的原因，对相关案例进行了研究，金银器流失在文化层面的影响重大。一方面金银器等文物流失带来了文化创伤，另一方面对文化的保护予以警示。

（一）文化创伤

中国金银器通过上述多种途径流失海外，造成了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层面的创伤。从物质文化而言，金银器是中国古代生产生活的产物，中国流失的这些金银器的材质、造型、纹饰、工艺等本身就是极具价值的。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了很多与金银器相关的工艺，部分流失金银器直接对一些文献记录进行了印证，完善了史料信息，同时这些金银器造物精美，是研究中国古代审美追求的重要依据。

从非物质文化层面而言，金银器的流失对哲学、美学、艺术等方面造成了创伤，流失的金银器文物承载的非实体价值是与实体本身并重的，这些器物凝结着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从匠人精神到设计造物思想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二）文化警示

从另一视角来看，流失金银器带来的还有文化警示。金银器流失引发了对中国文物保护及回归的思

考。自鸦片战争以来，有超过1000万件的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港澳台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这些庞大的数据中就包含着金银器，文物保护与回归的行动一直在进行，而如何尽可能让文物回归相对而言是更引发我们深思的。

从文物实体条例来看，在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上也获得了一些警示，文物流失被动地让文化走向国门，正因人们深刻认识到了文物被动流失带来的伤害，现在才能够采取更好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方式，吸取外来文化优点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结合，产生新的文化传播形式，促进未来的文化交流。

五、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金银器因为不同的途径流失海外，这些金银器承载着中国的历史、哲学、艺术等思想，它们的流失给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都带来了创伤。但更重要的是，从这些流失的金银器中增进了对文化的思考，金银器的造型、纹饰、工艺或许可以进行模仿，但背后的文化内涵是无法再次复制的，也正因如此，学者们愈发重视对中国古代器物设计的研究，从造物思想、美学呈现、现实价值等方面丰富现代设计文化内涵。

参考文献：

- [1] 陈明锋. 民间文物流失忧思录[J]. 检察风云, 2007(10):14-17.
- [2] 柳扬. 瑞士乌尔泽藏秦式金银器[A]. 秦时期冶金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4年, 95-108.
- [3] 孙机. 洛阳金村出土银着衣人像族属考辨[J]. 考古, 1987(06):555-561.
- [4] 齐东方. “黑石号”沉船出水器物杂考[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7(03):6-19+158.
- [5] 朱天舒. 辽代金银器[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8.08.

基金项目：2020年度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丝绸之路国家金银器设计跨文化研究”（编号20A160）。

作者简介：

王美艳（1974-），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艺术与设计史论。

谷欣蕊（1998-），女，湖南衡阳人，就读于湖南工业大学包装设计艺术学院，研究方向：设计历史与理论研究。